

文庫博物館專集（五十六）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在下面

搞“四清”。7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8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毛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听了5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毛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到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上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经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桔子。

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

叶群在会上介绍了她与主席的谈话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1965年5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 1.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 2.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
- 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 4.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雷英夫和我在一个小组，表现十分活跃，大讲罗对毛、林的不满，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在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现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很不明朗。贺龙讲了几句。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消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毛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以的，怎么现在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

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13日会议结束。

16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来应该由在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有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提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毛主席决定开会，大家都赞成。会后，军队就开始批判罗瑞卿了。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毛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人的事情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的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迷信中医。抗美援朝这么大一件事，高级干部应该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与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高岗这条线。斯大林和高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90%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彪在一旁说99%。“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彪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作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林彪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牢牢掌握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有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 （二）一九六六年三月

1966年上半年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上海会议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的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军委。纪要经毛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彪报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下发。

3月8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8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

总理赴邢台视察后，12日到16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16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会议还未结束时，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杭州开会。

17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5时，我们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没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毛主席讲吴冷西，乔木，“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者，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事，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主动。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还是中央秘书长的角色，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听起来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以后事态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任何结论么。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3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对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愤，光听会上揭发的事，那么罗的问题就大了。

20日上午会议结束。

21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23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 （三）一九六六年四月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召开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饭店（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的？3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我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以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话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

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知道事情大了。

会议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发表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文章我始终没有看到。我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19日开始开会。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意在那里住，他愿意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联系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

我们都在西泠饭店。吃过饭，出去散步，六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和彭真并行，并且都不和他说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是我们也只讲点废话，“天热了……”等等。谁也不敢讲正题。

4月21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1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到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王任重起草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种比如刘志坚回忆：4月14日总理把他叫到钓鱼台8号楼说，中央决定刘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俩飞上海，当天康生，陈伯达，江青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5月1日刘回到北京。这就是说，第二次杭州会议还没有开，中央已经在组织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两人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都没有话讲。开始三人在一起，面对面干坐着，后来宋任穷离开前舱，到工作人员那边，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俩的任务是“护送”他回来。

到机场后，我们各自坐车走了。后来有人说我把彭真交给了安子文了，这是不对的。

上海会议搞罗，三月会议点杨尚昆，陆定一，四月会议批北京市委，批彭。这时谁都知道，问题刚刚开了个头，远没有完。谁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发展。这时北京大家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消息。

#### （四）一九六六年五月

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般说法是3日开始，先召开了几个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我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北京市、华北局，准备开汇报工作会议。工作十分紧张。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的工作。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副主席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面对主席台的左手。我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来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

- （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 （二）叶群与王实味、X X X根本没有恋爱过。
-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
-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

他刚开始讲，有人在后面，手里拿着什么资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聂帅拿着林彪手书，生气地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给主席台上提意见。

这事与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的夫人严慰冰的。这么严肃的会议，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

从会上看，刘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认为他有错误，但不同意这么搞。看得出少奇有气，压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会议，等于反对他自己。总理也很慎重，不讲话。康生挺得意。

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

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

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严重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通知”一通过。形势就严重了。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会议休息了两天，到18日继续开，仍是刘少奇主持。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即有名的“五一八讲话”。

林彪在正式讲话前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很好。”

林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学生），你怎么那么整我？”

因为林彪点了名，会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散会了，我们知道常委在那里开会没有走，陆定一在旁边屋里等着。

邓小平喊我进屋，让我和李富春去和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

富春非要我领头。我让他：“你是政治局的。”

我们俩站起来，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的门口只有几步路，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门口，他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一进门，我就靠边坐下。坐下后，应由他先说，他又推说让我先说。陆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说。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这是邓小平找我谈的，谁找富春说的我不知道底细，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

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富春也说：“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中央决定……”

林彪讲话事先做了准备，他有个简单提纲，字有桃核大，他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主席召集政治局扩大会，集中解决了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杀气腾腾，大谈“政变”，从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国政变，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话。

林对杨问题的讲法也同邓小平对我讲的不同。小平说：杨尚昆是单干户，他是有事。但是什么事，他没有说。

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调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调叶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我任北京第一书记。讨论时我说：“我一个人不行，调一个人做副书记。”候选人

提了两个人，吴德和华北局什么人。1936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最后决定吴德任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为书记。

2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这两个文件都下发到县团级。

（五）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的东墙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后来才知道这是康生搞的，他早就派他老婆曹轶欧等人在北京大学串联了。

大字报一出来就将党内矛盾公开了，而且这是1957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一下子引起轰动。学校内部，学生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两派各说各有理，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在辩论中青年人火气大，有个别人动手，发生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消息马上传到国外。北大校门历来是开放的，外面的人闻讯后纷纷进去看大字报。

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要我去北大，说：“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联。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看来他们放了火，还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怕火烧到自己，急于稳住阵地。

我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这时吴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

陈讲：“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作工作，不要上街。”我想，非中央讲话不可，我也不能给主席打电话，现在半夜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联系，因而没有答应。又拖了一下。

陈伯达急了，第三次给我打电话，话讲到这种程度：“非你老兄上台不行了。”我还是不答应，他又说：“我们一块去。”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已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负责运动的。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

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也来电话说：我刚从康老那里回来，康老要你和蒋南翔一起去。康生的意见是：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过了一会，康生就来电话了。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他说：蒋南翔已经过来了，你不来也可以。我说：陈伯达来过电话，要我讲话。康生听了没有多的话，表示可以。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我抓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说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干部，池必卿能做她的工作，和外面的人通信。这一切安排好了，已是12点多。我与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这暴露了康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也在。他们在礼堂召开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议，而且已经开过了。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

陪我上主席台的是刘仰峤和张彦。又要开会我讲什么？我就叫张彦提供一些情况，传达周、康、陈的指示。我一边听，一边想，心里生气，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请张彦先讲讲，我主持会。他不讲，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25分钟。后来群众概括为几条：1，不提倡写大字报；2，大字报要内外有别；3，要有领导；4，要有步骤；5，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

会后我回到家里，睡不着，心里考虑，中央还未吭气，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天还没有亮，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不想碰了钉子。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一个话，他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我赶快就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少奇说：“那也不要。”说完了，他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儿。这句话把我解脱了。

通过这一天的事，觉得康、陈是对我来了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 （六）一九六六年六月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的社长职务，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并由他领导。

改组后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无论有着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五一八”讲话精神公布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6月1日，我们正在开华北局会议，由我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得匆忙，我已经记不清了。因为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的条子。

6月1日晚八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施残酷无情的打击”。各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不可收。

∞ ∞ ∞ ∞ ∞ ∞ ∞ ∞ ∞ ∞

“九一三事件”中的一个谜：毛泽东突然离开杭州

〔编者按：“九一三”事件已经整整二十八年了，至今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其中之一是，毛泽东怎么会突然离开杭州，飞速赶回北京，避开了林彪一伙对他的突袭？《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一书（陈长江、赵桂来著）披露了一些其中的内情，现摘录如下——〕

（1971年）9月3日毛主席乘火车从南昌到达杭州，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内。列车刚稳，住处还没安排，毛主席就在车上找浙江省的领导同志谈话。

在刘庄住下之后，我接触到的工作人员，都感到熟面孔少了，新人多了。过去我们来浙江，警卫都由当地公安机关具体部署和实施。这一次，省公安机关的那些老熟人不见了，外围警卫系统由陈励耘负责。他是空五军的政委。

毛主席这次在杭州，随着时间的延续，他的情绪越来越不安，不知他发现了什么，还是怎么了，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个杭州的警备大权，都是陈励耘管着，而毛主席对这个陈励耘不知为什么，又很厌恶。越到后来，毛主席了解到可疑的情况也就越多，越觉得问题严重，对他们也就更加不信任了。

9月8日午夜，我们刚吃过夜餐，毛主席突然叫小商，要他立即通知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铁路专运线上的专列，趁夜转移至杭州和上海之间嘉兴近旁的一个叉道上，离杭州足有百余里。到底为什么要把专列连夜远调？毛主席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9月10日这一天，中午刚过，毛主席忽然告诉我：“现在把火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往哪里走？没有说，只是交代说：“不要告诉陈励耘他们，也不要他们送行。”我们的警卫部队很快进入登车状态。为应付发生的意外，我安排前卫车和后卫车分队人员提前进入车。9月10日下午3时，我们的专列离开杭州车站，向上海方向急驶。

毛主席为什么突然下令提前离开杭州，事后我才了解到：毛主席在刘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将陈励耘布置的向他汇报毛主席活动情况的特殊任务，报告了毛主席。

此次外出，最使人担心、情况最为复杂的是上海这一站了。当日下午6时许，我们的专列顺利驶抵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往常，毛主席每到这里都要下去住几天，这已是二十多年来的习惯了。因此，我们按惯例做了毛主席下车的准备。列车停下来了，毛主席却没有下车，而是立即把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找到火车上来，或开会，或谈话。毛主席与他们谈了约一个多小时，这几位就下车回去了。

我们在火车上吃晚饭，并安排过夜。汪东兴要求我们，严密部署列车周围警戒，重点部位要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值班。我们一下加了五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佩带了冲锋枪。高秘书10日晚上给南京打电话，要许世友第二天到上海来。许世友到了后，与毛主席谈了一个多小时。许世友说，请主席放心，南京军区指战员听党中央的指挥，我们已做了安排，有了准备。

毛主席已一天一夜没有睡觉了，还在那里看文件。晚6时许，到达南京下关车站，车一停，我见许司令员已在车站迎候了。但是，这次毛主席没见他，不过他一直在站台等到我们的专列开走。

主席的专列驶过长江大桥，向北疾驶。按往日习惯，通常要在蚌埠、徐州等车站停顿，这一次却一反往常，一路不停，于12日凌晨到达济南火车站。毛主席原打算在济南火车站见杨得志司令员，后因他不在济南而未见上。专列向北急驶，直奔天津。在这个站，既没有人上车，也没有下车的，仅停15分钟加煤加水检修机车，便出发了。

恰在这时传出毛主席的话来，让在丰台火车站停车。丰台临近北京，火车行驶不足20分钟的路程就可到达北京火车站。毛主席往常外出，从来没有在这里停过，这是为什么？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

~~~~~

【研究报告】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七）

• 宋永毅 • 孙大进 •

第八章 清华四 • 一四思潮：河归旧道十七年（续）

四 • 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

（原注：据了解，信的作者是四一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的负责人，四一四核心战斗组《云水怒》的负责人周泉纓。）

××同学：

你的来信收到了，请你代我向全体河南造总的战友问好！并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流血牺牲的战友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挫折和困难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他将严整我们的队伍，锻炼我们的意志，打光我们的媚骨、“公正”和软弱。形势将逼迫我们更加独立自主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析河南的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的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主张，我们能够修正自己在前进道路上的错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我们决不动摇、决不消沉、决不颓丧。我们更要千百倍地振奋，更加猛烈，更加巧妙地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当仁不让地担当起大联合的核心人物来。

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有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证法的一课，上了他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

在这痛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因为从祖国的白山黑水到曾母暗沙，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主力军！也只有依靠我们，依靠这一支唯一能够真正代表工农兵和广大劳动人民最高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将是历史的结论。

而上述问题都将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在这里我们作一些探讨，对在艰苦奋斗中浴血奋战的战友也许会有用处。

## 一．阶级关系的变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空前伟大，空前深刻的大革命。它所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而大踏步地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问题，也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领袖所在的时代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在领导中国的工农兵解决这一最伟大的问题。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因为任一场大革命都是变更阶级关系并解决一个相应的政权问题。这点文化大革命和一切革命是一样的。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阶级斗争没有熄灭！阶级斗争依然在急剧地进行着。资产阶级为了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将通过更新的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这种新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指出的，通过党内“走资派”，夺取政权实行和平演变。而无产阶级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决地进行反复辟反演变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它不断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

在这场新形式的阶级斗争中，毛主席首先发现和扶植了一批无产阶级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先进力量，他们在毛主席的统帅下，最迅速地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用毛泽东思想去领导广大劳动人民与自己队伍中演变的走资派作坚决的斗争。并且将进行一次一次的大革命，把他们赶下历史舞台。没有这新生力量来替换先锋队中的腐朽力量，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支力量也在新陈代谢。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相应政权问题的解决。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与民主革命以及苏联本来的革命有着很大的区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特点和基本事实。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根本上说当权的是无产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钻到党和国家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正因为这样，“走资派”在中国的地位和苏联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党内政权机器内未占统治地位。他们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也正因为这样，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决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

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化。相应的政权，也是局部地改变的，而不是彻底的改变。

否定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新生力量代替腐朽力量的现实或片面强调文化大革命前阶级关系的稳定方面都是错误的，都可能会陷入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泥坑，成为右倾保守思潮。

但另一方面，抹杀文化大革命和其它革命的差别，夸大阶级关系的变化方面，把人民内部少数教育的过程，误认为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和阶级关系的大翻个儿的过程，从而导致什么文化大革命后财产权力必须再分配的估计，也是极其反动的，是极“左”的，其结果必然从“左”的方面来复辟资本主义。

当然，目前来说：第一方面是最主要的，但是也必须注意第二方面，否则革命以后也会出现另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其它的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分路扬镳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是两种造反派（即团派和四一四）一系列深刻的原则分歧的争论点。

## 二．派别的规律性

列宁说过：“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有知识，最彻底最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的发展。如大学生的政治派别的发生划分和社会政治派别的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就不称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上的派别的实力和人数上完全相等，而是指社会上有那些派别，大学生必然的而且不可避免的有那些派别。”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也是如此，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首先最明显地反映到学校中来，清华大学四一四派与团派的原则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造反派分成了两派，而且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派。

尽管不同地区两支造反派各有其特色，其自觉程度不相同，其尽到的成绩以及所犯的错误性质程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规律性的共同性。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给予各地两支造反派统一的称呼：四一四和团派，代表这两派政治主张的政治思潮是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

四一四派和团派在解决和党内“走资派”这个主要矛盾时是统一的。因此他们在摧毁反动路线同一战场是战友，在“走资派”的白色恐怖下尤其如此。当然两派在战斗中都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例如有的团派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四一四派一定程度上保了军区反动路线，但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点明，一般他都改正错误，在大敌面前重新统一起来，今天河南造总改正错误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个别地转向反面是有的。

但是在夺权问题上，即由谁来掌权，依靠谁，团结谁，镇压谁这个阶级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就急剧地爆发、激化，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有的地方以至于发生激烈的武斗，几乎在每个地区，当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盾稍稍下降时，四一四派和团派在思潮上的分歧就会迅速上升。

由此可见，四一四和团派的分歧是有规律性，而且是非常原则的，不可调和的

从历史上看，四一四派几乎都是从白色恐怖中最早杀出来的造反派，她的历史最久，在和刘邓血战中功勋最大。当团派的很大一批骨干力量外流、躺倒，以至于向保守组织交悔过书的时候，往往都是四一四这批造反派在白色恐怖下，争取胜利。不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由于认识问题也犯有这样那样的右倾错误，但是比起溜走、躺倒，以至于倒戈来总要好上千万倍！退它一万步也为造反派提供一些经验和教训。

从组织上看：四一四派的队伍是比较整齐的，造反派大多数的工农兵基本群众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的党团员和干部，都是“铁杆”的四一四派。而团派的队伍是称不得整齐的，还经常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

从政治观点上，四一四思潮是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比较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关于防修反修的伟大理论，不仅牢牢地记住当前的主要敌人，坚决地打倒他们，为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战，而且能够看到大革命以后的全面的阶级关系以及长远的防修反修的目标。对将受蒙蔽群众，努力团结他们，热情地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对犯错误的革命干部和要革命的干部，四一四勇敢地保，热情地帮，大胆地用——所有这些都是在防修反修必须的。

而团派，由于他们的革命性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散布的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排斥一切的无政府思潮的影响，他们要“大翻个儿”，妄图根本变更十七年来的基本的阶级关系，而重新划分什么“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由“造反阶级”来压迫“老保阶级”，实现什么“财产权力再分配”即是说要把“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据说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又是谁呢？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吗？不是。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有权的。对他们来说是如何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绝不是什么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新中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什么人没有权力和财产呢？什么人对此具有最“激进”的要求呢？只能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只能是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以及被取消了政治地位的地富反坏右。这样的“再分配”干脆改名为反动阶级的“反夺权”，不是能够说明它的实质吗？

这种“大翻个儿”重新划分“老保阶级”和“造反阶级”“实行再分配”等等，团派思潮的实质是十分反动的，这也是团派在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如何正确对待战友和同盟者，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等一系列问题上“屡犯错误”并且“屡教不改”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造反派中的两个派别，两种思潮向往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前途，因此尽管在当前对待党、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问题上是暂时统一的，但是一旦这个主要矛盾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两种思潮谁战胜谁的问题就会迅速地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可以肯定，团派作为一种思想是一定要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的，其顽固的代表人物滋长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历史所淘汰。当然团派的多数优秀分子在毛泽东思想的抚育下，将会抛弃这种极“左”的思潮而布尔什维克化，或劳动人民化。

### 三．斗争的复杂性

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局部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是尖锐复杂的阶级大搏斗，也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

各个阶级的代表势力都纷纷出来顽强地表现自己，以便让历史对我们进行选择，胜利的胜利得更彻底，垮台的垮台得更痛快。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这是问题的本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大多数人来说是个新课题，工人运动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需要从外部向工农群众灌输。这个灌输的过程是少数教育多数的过程，也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重新学习如何在无产阶级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革命的过程，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一部分人会受蒙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内部也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

毛主席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中正确指出，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一方面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于是文化大革命出现了这样的复杂情况：一方面我们的主要敌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运动中的次要矛盾，比如人民群众中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工农兵和他们的次要敌人即地富反坏右的矛盾来掩盖运动的主要矛盾，转移群众斗争大方向，以图保护自己。有时他们利用“造反派”队伍特别是团派的队伍不纯挑动受蒙蔽群众去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有时他们则通过无原则的吹捧利用团派中的“极左势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所谓“右倾势力”的四一四派，特别是参加过保守势力的曾受蒙蔽的群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等等，等等。归根到底，激化次要矛盾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手中的大权，并且有朝一日利用他们手中的政权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我们的次要敌人，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地富反坏右及其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顽强地活动起来，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混入了造反派的队伍（主要是团派）他们表现得“极左”，对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要求最迫切，他们咬牙切齿妄想一棍子把受蒙蔽的工农群众打成“保守阶级”，而他们自己则成为压迫“保守阶级”的“造反阶级”他们仿佛也在革命的航船上划桨，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把船撞暗礁上，以便来个阶级关系“大翻个儿”复辟资本主义。当然，他们也很清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他们自己在台前表演是不利的，因此他们拼命地在造反派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通过他们来实现自己的企图。在实际中他们和他们的代理人往往利用“团派”中小资产阶级革命派革命家的狂热性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去打击四一四派，排斥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革命干部，篡夺政权，为全面复辟作好准备。

应该注意这里决不是“几条小鱼儿”在翻浪的问题，而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隐患，其形式完全和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类似的，只不过是反动阶级新的代理人的手腕，可能更高一些，形“左”实右的迷惑力更大一些。因此我们在夺权的时候不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在各个局部的地区，正如毛主席说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对于这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切不可丧失警惕，被敌人利用。在对付他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有革命的魄力和铁的手腕，为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把走资派手中的权统统夺回来，我们要结集最可能的同盟军，甚至大魄力地利用一切次要敌人的力量划几桨，然后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彻底暴露本来面目的时刻毫不犹豫地他们将他们打落水中。一切的一切为的是掌握政权，巩固政权。相反，对待防修反修的主力军，对待受蒙蔽的工农兵群众和犯错误的

革命干部，必须严格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力求使之不向我矛盾转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努力按照毛主席教导，坚决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这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

列宁对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艺术作过科学的总结，他说：“要战胜比较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那怕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那怕是极小的机会，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

列宁强调指出：“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这就是说，这种斗争艺术也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法则。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不懂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超阶级的“公平”“合理”思想，都将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必须坚决肃清他们。

#### 四．军区问题

全国各军区进入运动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局势起了极大的变化，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支左工作，他们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愧为无产阶级、工农群众的子弟兵。许多军区和部队的领导干部，都在不同程度上执行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坚决支持造反派，特别是支持成份比较好的，代表广大工农兵最高利益的四一四派。

但是就在这时，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抛出一条带枪的反动路线，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利用四一四派和团派的矛盾破坏他们共同对敌的联盟，削弱造反派力量。同时扶植保守势力，并利用受蒙蔽的群众和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和团派之间的矛盾，激化这种矛盾，首先打击团派，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河南就是典型。

第二，在政治上利用矛盾的同时动用专政机器，应用枪杆子镇压造反派首先是团派，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第三，在中央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之后，就欺骗受蒙蔽的广大群众和战士，把矛头直指中央，制造暴乱事件，武汉则是典型。

相当多的军区和部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对军内走资派的阴谋估计不足，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这条带枪的反动路线，也有的是在策略和方法上犯错误，这样就压制了造反派，特别是团派。而客观上壮大了保守派。

于是二、三月份之后，各地造反派出现分裂，保守派重新抬头，大规模武斗发生，甚至出现了局部的政变，局部的武装暴乱事件，文化大革命遇到新的障碍。

在新的障碍面前，必须出现新的高潮，四一四派和团派都开始逐步意识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当前最关键最迫切要解决的是军权问题和支左问题。因此两支造反派的主攻方向开始统一起来，这里似乎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然而四一四派和团派由于组成成份，发展历史和思潮特点有质的差别，因此在对形势前途。敌我友力量的分析以及战斗的部署和策略等等都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团派认为各个军区犯错误的原因完全是黑手操纵的，完全是自觉地和林付统帅的对抗。因此团派的同志嘴里不说心里想的是自下而上地象去年炮打司令部那样去冲军区，“彻底砸烂”“彻底平反”。对待压制过自己的保守派，基本上是“文攻武卫”，象对待蒋介石的士兵一样，对待四一四派特别是对那些在对待军区和对待团派有错误的四一四派则是“二白匪”“二老保”坚决镇压，完全吞掉！而且应该比老保首先吞掉！

在团派看来，全国都是如此，枪杆子已经完全被“敌人”掌握了。全国性的内战全国性的武装夺权，是不可避免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为“武化革命”。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枪杆子的领导权，局部地改善军权，变成了全面的大规模的武装夺权，象以前那样，团派对军权问题，对枪杆子问题是很敏感的，很重视的，很坚决的，他们很快就把主攻目标转移到军区问题上，然而私字夺权观，将使他们犯错误。他们想夺权的是基本上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军权，想来一个“造反阶级”压迫“保守阶级”的军权“再分配”这肯定是要碰钉子的。

总之，团派的种种分析和种种作法将更加激化那些次要矛盾，将在实际上模糊主要矛盾和分化、削弱造反派。

我们四一四派则认为，首先必须紧紧跟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部署，对军区的问题，军权的问题，对枪杆子问题必须给以极大的重视和充分的估计，克服过去对枪杆子对权不够敏锐，不够重视，不够坚决的弱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枪杆子是无产阶级的，任何私字夺权观，把阶级的军权割据为小山头的，某个小团体的武装的企图和作法都是错误的，我们的军权只能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权，而决不是“造反阶级”镇压“保守阶级”吞并自己战友的权。

对于军区错误，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划清界限，对于伸向枪杆子的黑手必须揪出来，坚决斩断。但是，我们四一四派认为建国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毛主席有最高的权威，我们的军权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是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除了无产阶级将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掉“拉出去，打进来”的阶级敌人以后，我们社会主义阶级状况是不可能有什么原则的变化。政权，特别是军权将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因此四一四派在对待军区问题上必须坚持四一四派的特点，坚持四一四派在对待受蒙蔽群众和犯错误干部等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有革有保，该打倒的坚决打倒，该保的坚决保。对因认识问题而犯错误的军区和部队的干部，必须一看二帮，热情地团结和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种不加分地，象去年冲击省市委那样去冲击大多数的军区是错误的，“彻底砸烂”“彻底夺权”更是要不得，在军区干部问题上，反动路线再想借手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绝对不可能了。

我们认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状况下，党内军内走资派在全国范围内结聚受蒙蔽群众，并使用他们充当全国规模的暴动的工具是不可能的，既没有能使受蒙蔽的群众及战士所接受的公开的政治号令，又没有足够的舆论。因此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可以采用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策略，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军区，各个解决他们的问题，实际上目前已经这样做了。

重要的是，主要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听从毛主席、林付主席

的号令，进行着一切必要的军事布局和政治准备，以应付一切突然的事变。所以只要处理得当，全面内战是打不起来的。

应当看到，由于本身的弱点，相当大部分的四一四派在对待军区问题上，对待团派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现在在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中，在巩固无产阶级的军权的斗争中，四一四派将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军内走资派划清界限，修正自己过去在对待团派问题上的错误，完成一个痛苦的转变。正如你信中说的：河造总当前就在打倒何远洪，改正错误，完成这个转变。

当然我们这样分析完全不等于不准备战争的一手，特别是有人要用武力吞掉我们，打垮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采用相应的自卫手段，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局部地正在进行着初步形式的自卫现代战争了。但是即使全面内战因为各种因素打将起来，或者继续发生局部暴乱和大规模的武斗，我国社会的基本阶级状况是不会有原则的改变的。那些只知道空喊武装斗争而不知道对武装斗争的阶级斗争，阶级目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做调查研究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的人和忽视武装斗争的人一样，同样是可悲的。由毛主席把握轮舵的革命航船将绕过一切或明或暗的礁石，奔向共产主义！

我们四一四派应为实现我们的政治观点，实践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努力奋斗！

## 五．四一四思潮必胜

当前各地团派一片呼喊：“河南造总要垮台了！哈尔滨山上派掌不了权！武汉三新靠边站！……清华四一四派必败！全国四一四都完蛋！”有些团派同志企图把四一四派打下去，扫除夺权斗争中的“隐患”。

可是他们不知道，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即使是日趋破落的政治势力，在未完成历史使命时都不可能人为地将它推出历史舞台，何况一个真正代表工农兵最高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呢！四一四派是压不垮、吞不掉的。暴力有时后看起来是万能的，但暴力一旦脱离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最高利益就会被新生的暴力所消灭，个别四一四派也许会被走资派所操纵而走向反面或被压垮，但从整体看，四一四必胜！

为什么四一四必胜！首先，在当前的各派别，各思潮当中，四一四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列宁在分析布尔什维克的历史时说：“革命准备年代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最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凡是一九零五年——一九零七年间以至一九一七年——一九二零年间引起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他们最初的提法。”……各阶级成份一贯表现，特别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考查，四一四派是最接近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布尔什维克派的。如果说四一四派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那么克服这些缺点错误就将四一四派无产阶级化，布尔什维克化，将四一四派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完善起来。四一四是在克服着种种困难，在各种批评指责，甚至总在打击下“锻炼自己所必须的政治思想武器”。这时为了迎接历史赋予的重任而必须经历的痛苦的过程，困难和曲折的局面，胜利在等待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派。

而团派虽然也有许多真正勇敢的造反派，他们完全能够布尔什维克化。但团派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更接近列宁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极“左”思

潮，这种思潮当中不可改造的真正的代表人物的政治目标并非是为了防修反修，因此作为思潮而言，当他发现已经完成历史交给它的冲锋陷阵的任务了，到那时候这个思潮的顽固代表人物也被无产阶级的手腕捏得粉碎。

更主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从一小撮走资派手中把权夺过来，并且稳固住这个权，就必须有四一四这样一支真正的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为核心，现在全国成立的六个革命委员会中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夺权的，又有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而使政权稳固的，事实证明团派夺权以后，常常不能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不能正确地对待他们战友和自己的缺点错误，甚至不能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使政权不能稳固，这也是我们和团派的根本分歧所决定的。因此，成为政权的稳固基础的成为大联合的核心的只能是四一四派。

只有四一四派能够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一四派必须也完全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团派，团结团派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但是这种“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无产阶级长远的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手中，四一四派当仁不让地应当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看不到这一点，在这种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面前总觉得自己比暂时优势或暂时被团结在“统一战线”内的其他派别矮一截，因而软弱退缩，迟疑不前，这是四一四派内部目前最主要的右倾危险。

还必须看到，夺取政权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列宁说过：“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会发生千百种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大的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况，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确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毁他们）这种人在大转变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错误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列宁又说过：“在革命已经暴发，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要花费极大的力气，可以说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要完成所提出的稳固政权这一系列工作，扫除大革命中反动阶级留下来的罪过，真正实现防修反修的目的，没有四一四派这样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是不可能的，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的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之后，团结一切力量，尽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派手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呢？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四一四派！

革命化的四一四必胜！

你的战友××

《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东方红支队在四一四内部印发《四一四思潮必胜》的按语：

这封信是我们一位同志给他的一位战友的。

我们认为这位同志信中的坚持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些观点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四一四思潮”。

我们坚信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四一四思潮会取得最后胜利。

予此我们发表该信全文，以供革命同志参考。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

□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 ∞ ∞ ∞ ∞ ∞ ∞ ∞ ∞ ∞

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  
最高指示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伟大的转折完成了！阴谋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小集团暴露了他们全部诡计和阴谋相继破产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从他们手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文化革命的权，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避开了一大暗礁，将革命的航船向最后胜利的方向急驶！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反革命两面派的顶峰，它是封建统治阶级向先进的革命势力作最后的拼死挣扎的产物。袁世凯以他反革命两面派特别的“机智”和特别的“手腕”夺取了清朝皇朝的政权，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革命志士的血泊中又竖起了一个封建王朝——袁世凯王朝。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袁世凯登峰造极的反革命两面派手腕拉垮的不是革命人民，而是他自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袁世凯和他封建的政权被革命的浪潮淘尽了，而袁世凯以险恶的两面派手腕而遗臭万年。

今天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后胜利冲去了，资产阶级要彻底完蛋了！这是无产阶级胜利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势必要以百倍的疯狂，万倍的阴谋来作最后的挣扎，因此袁世凯式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他们看到他们原来的主子已经被革命人民打倒在地了，并且踏上了千万只脚，要重新翻身一时是不可能了。于是他们就利用在党内的地位，搬出了他们老祖宗袁世凯的一套，大耍两面派手腕。在关键时刻，总是以“左”的和“右”的方面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企图使已经取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付之东流，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以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航船翻个个儿，重新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得力干将陶铸就是“袁世凯”式人物中的一个。袁世凯式的人物都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也是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家。他们第一个特征就是千方百计贬低毛主席，贬低林付主席，相应抬高自己的地位，大肆吹捧自己，这正如姚文元同志所说的：“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的自我吹嘘，他们利用他们的职权和地位，在大革命中拼命地耍阴谋，打击和贬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利用一切机会来宣扬自己，以至于连群众的小字报也不放过，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企图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假象，他们领导文化大革命是具体的真切的，而毛主席、林付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是抽象的、空虚的。他们一方面在行动上利用手中大权千方百计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背道而驰，故意贬低代表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一些文件和口号，甚至干脆无视这些重要文件和口号；另一方面，又装得十分谦逊，以便炫耀自己，腐蚀迷惑和欺骗那种不坚定的群众以及幼稚的青年人，陶铸在

中央的几个月中就是这样干的！

要篡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篡夺党政军大权就必然削弱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以至于搞倒无产阶级司令部。袁世凯式的人物第二特征是：“他们用貌似极‘左’实是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文化大革命来长期存在着一股炮打总理的妖风，这股妖风非常顽强，无论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警告也压不下去，这就是袁世凯式的人物耍的由他们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但就是不怀疑自己，不打倒自己只打倒别人。此外二月以来，群众中广传着一种中央文革分派的流言，什么总理、康老、王力、关锋、林杰是一派，江青、伯达、戚本禹是另一派。袁世凯式的人物自作聪明，以为放出这种风来既能利用极“左”思潮造谣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又能巧妙地掩盖自己；既能促使左派犯错误，并巧妙地利用他们的错误，又能最好地保存自己。可是天公不作美，武汉事件和全国性的5 1 6兵团赤裸裸地暴露了袁世凯式的人物的一切伎俩，这般自作聪明的家伙，真象其老祖宗袁世凯一样，逃不过历史的无情惩罚！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反对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袁世凯式人物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大搞垄断，积极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姚文元同志说得好：“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很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的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

袁世凯式的人物不但企图垄断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垄断了一些主要的报纸的权，而且还企图垄断外交权，企图垄断行政权，甚至企图控制总理的常委大权。不仅如此，他的手伸向了军权，他们运用天空中的一点乌云，神经质地夸大，促进左派犯错误，散布“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企图打烂伟大长城，分裂伟大长城的人民解放军，全盘地搞垮毛主席和林付统帅的军权。一手篡权，一手搞“大翻个儿”，其心何其毒也！

袁世凯式的人物的第四个特征是抹煞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装出一付热情歌颂群众运动的样子，放纵小资产阶级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泛滥，从而把群众运动引向歧途，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纳入资产阶级轨道。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以马列主义的最高热忱歌颂了贫农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这儿毛主席所歌颂的群众运动具有最最鲜明的强烈的阶级性，乃就是坚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毛主席在文章中着重指出了贫农是革命先锋。可是袁世凯式的人物似乎比任何人都热情地歌颂群众运动，但是在极“左”的看来热情洋溢的歌颂下面，把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无政府主义排斥一切、怀疑一切等等资产阶级的东西硬塞到今天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群众运动中，以此实现其“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上台”的阴谋，从根本上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林付统帅说得何等好啊！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毛主席在文化革命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可是袁世凯式的人物违抗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以极“左”的面貌去纵容革命队伍中有的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和派性，并利用这些东西加剧和另一支革命派的矛盾，分裂革命队伍。更恶毒的是将革命派之间的矛盾引向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阶级阵线的轨道。陶铸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来之后大力散布“怀疑一切”的思潮，提出极“左”口号顽强地把运动引向歧途。林杰一方面支持4 1 4，而另一方

面又和团派大谈支持4 1 4的辩证法，和其集团上下配合加剧团派和4 1 4派的对立，并且煽动团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武汉事件发生以后，袁世凯式人物大力宣扬极“左”口号“抓军内一小撮”，妄图一举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军队，把运动拉向最右方。但是袁世凯式的人物所做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枉费心机，这一切的一切连同他们自己都将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个粉碎！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人民革命——历史的火车头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飞奔疾驶的必然趋势，也决非袁世凯式的人物所能扭转！

袁世凯式的人物的第五个特征就是极高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以极“左”的口号来实现其极右的目的。。他们不仅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提出极左口号来把干部、群众、军队推向敌人方面，以达到“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搅乱阶级阵线，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目的，而且不断地煽动我们队伍中的极左思潮，迎合地富反坏右的“权力再分配”的强烈欲望，去冲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官，他们特别重视黑龙江省的革委会似乎比别处更为重视一些，大概是因为东北三省对中国太重要了吧！

袁世凯式的人物第六个特点就是登峰造极的反革命手腕和反革命的“机智”。武汉事件和武汉事件后的一系列奇怪现象就是袁世凯式的人物继陶铸的换头术后创造了又一次政客手腕的奇迹。

武汉事件是袁世凯式人物的极右企图暴露以后“机智”地退却的一个大阴谋，一方面保护实力，一方面制造混乱，促进左派犯错误，进一步把水搅混，与武汉事件配合，立刻提出“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一些左派一时没有识破此口号的反动性，上了当，于是左派犯的错误被右派利用了，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以至于出现了某种危险。

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袁世凯式人物的阴谋。9。1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发表大转折的讲话点破了他们的鬼计，把准轮舵，敌人的布局打乱了，面目暴露了。然而袁世凯式的人物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顽强地耍弄他们“机智”手腕来搅乱阵线，保护自己。于是林杰问题突然泄露了。炮打林的风一下子象老天预先准备好似的乱将起来，运动似乎纳入了袁世凯式人物的轨道，谭厚兰被斗了，师大似乎翻了个儿，全市两大派的内战一触即发。

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及时地戳穿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两面派阴谋，再一次对革命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引导，袁世凯式的人物为了掩盖已经暴露的黑手的貌似特别“过火”的高级手腕又破产了！结果水并未搅混，反而进一步暴露了自己。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乌云敌不过太阳，小小袁世凯的两下子虽然能够篡夺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果，但也怎能敌得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怎么敌得过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统帅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阴谋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继刘少奇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现代“袁世凯”永远逃脱不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芒，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航道向彻底胜利的方向，突飞猛进！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看！在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极其重要的战略性的江青讲话发表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准了革命航船的轮舵，绕过又一大暗礁！

看！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了！袁世凯式的人物的一切阴谋破产了，无产阶级司令

部全部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大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空前巩固。

看！上海市革委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迅速成长壮大。所有已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大树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坚决斗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把我们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看！军委扩大会议胜利了！人民解放军牢牢掌握印把子，以保证文化革命后的大权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手里，以保证将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把文化大革命牢牢地纳入毛主席指引的轨道！

看！伟大的长城巍巍屹立，军民团结如一人，军支左，军爱民，民拥军。毛主席、林付统帅亲自统帅的人民枪杆子队伍牢牢地保证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看！全国一个上下结合的大批判高潮迅速来到，刘邓彻底灭亡之时来到了，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时候来到了！

伟大的转折带来了伟大的胜利！

打倒刘邓陶！打倒大小袁世凯！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 00 支队 1967年9月14日

〔大字报上有许多批语，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1. “本文作者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同志，真是混蛋透顶！”（北师大井造一兵）
2. “本文是一篇反革命复辟宣言书。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群众运动。立场错了。”（延河）
3. “他们分析得有道理。”（02一兵）
- 4.此文作者都为《必胜》的东方红00支队。〕

□ 原载《大字报选》（清华大学）1967年9月15日

（第八章完 待续：第九章 上海新思潮：在炮打张春桥的背后）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本期 校对：      | 曾 敏（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读者技术咨询：     | 荣 刚（美国）   | <a href="mailto:cnd-help@cnd.org">&lt;cnd-help@cnd.org&gt;</a> |
| 网络技术维护：     | 李健民（澳大利亚） | <a href="mailto:cnd-info@cnd.org">&lt;cnd-info@cnd.org&gt;</a> |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赵 桦（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CND》总编：    | 熊 波（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

C N D 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 W 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 T P 服务站地址：<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canada.cnd.org](ftp.cnd.org)[142.132.1.13]: pub/cnd/  
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